

长和平

冷战史考察

THE LONG PEACE:
INQUIRI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JOHN LEWIS GADDIS

[美]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 著

潘亚玲 译

东
方
编
译
所
译
丛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东
方
编
译
所
译
丛

长和平

冷战史考察

THE LONG PEACE:
INQUIRI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JOHN LEWIS GADDIS

[美]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 著

潘亚玲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和平:冷战史考察/(美)加迪斯
(Gaddis, J. L.)著;潘亚玲译. —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2010

(东方编译所译丛)

书名原文:The Long Peace: Inquiri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ISBN 978-7-208-09656-1

I. ①长… II. ①加… ②潘… III. ①冷战-国际关
系史-研究 IV. ①D8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20486 号

责任编辑 韩梅梅

封面装帧 王小阳

长 和 平

——冷战史考察

[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 著

潘亚玲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3 插页 4 字数 332,000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9656-1/D·1816

定价 46.00 元

致约翰·贝克与伊利莎白·贝克——和平缔造者

序 言

本书将向人们表明,当好奇心、好运气与不顾体面的机会主义相结合时,会产生什么结果。好奇心源于我的感触,即先前对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¹费力的理论分析,仍留下了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到底从苏联的行为中发现了什么样的威胁?华盛顿是否真的想要在战后欧洲建立势力范围?杜鲁门政府为什么一开始赞同避免在亚洲大陆进行军事介入,但很快又改变战略了呢?在没有任何可能会受苏联报复性攻击威胁的十年中,美国为何要克制自己不使用核武器呢?美国官员是否真的认为国际共产主义是“铁板一块”的?苏联人和美国人是如何发展出不试图击落对方侦察卫星的默契的?最重要的是,考虑到自1945年以来超级大国间前所未有的紧张程度,为什么还没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我有三个好运气:第一,档案的解密使大量原本保密的美国和英国文件得以公开,从而使开始回答上述问题成为可能。第二,我很幸运地参加了从基辅、北京、奥斯陆、帕洛阿尔托到芒特基斯科(Mount Kisco)等地举行的一系列会议和研讨,有大量机会提交研究发现、检验研究假设,并得到我的同事和相关研究领域的同仁们十分宝贵的建议(尽管未必总能听取)。第三,由于为这些会议准备了论文的缘故,我惊讶而又满心欢喜地发现,我用不着刻意计划便可以完成本书。

机会主义源于这样的事实,即某种程度上,我自己是在进行重复发表。本书中的三篇文章已以略微不同的形式发表在期刊或会议论文集

中,另外三篇也即将以某种形式发表。但这些已发表作品存在的问题是,它们必然与其他人就相关题目发表的文章有所不同,因此很难把它们与更广泛的关注联系起来。如果这听起来像是重新摆弄旧材料的浅薄借口,我并不完全否认。但我可用重构历史的合理性及我相信我绝非头一个这样做的历史学家的事实来为自己辩护。

我将这些论文放在一起的目的是讨论几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当代史”——即一个介于记者所报道的东西和历史教科书所传授的东西之间的时期——中现在有了可供进行详细的档案研究的资料;这些资料中所包含的内容,有时以惊人的方式改变了我们对于最近这段历史的看法;对“发生了什么”的回忆不同于“事实上发生了什么”的认识,这将能提供新的、有时是有价值的视角,我们由此可充分理解现状,甚至可能试图改变现状。²

我在这里想要对那些使这些论文能以最初形式出现的人士和组织表示感谢,他们是在每一章开始时所标明的那些具体的个人和组织。我必须补充一句,他们都无须为这些文章承担任何责任。我也得益于图书管理员、档案管理员及编辑们,如果没有他们,我们这些书写当代史的人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特别要提及的是美国国务院历史学家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他们出版了不可或缺的系列丛书《美国对外关系》(*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国家档案馆外交与现代军事部;伦敦国家档案馆;哈里·杜鲁门总统图书馆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西利·穆德(Seeley G. Mudd)图书馆;尤其是俄亥俄大学图书馆,那里的工作人员每次都竭尽所能为我服务。

与谢尔登·梅尔(Sheldon Meyer)以及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合作,对我和我在阿森斯历史系的几位同事来说,已经成为一桩乐事。我这次要特别感谢利昂娜·卡佩利斯(Leona Capeless)的出色编辑工作。我要感谢挪威大学出版社(第三章)和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第四章)同意我使用其版权,出版本人先前已经发表过的论文。

芭芭拉、迈克尔和戴维曾巧妙地向我指出,那些根本没记住我的书到底写了些什么的读者,却会在多年后不准确地忆及,我在前言中就我的家人写了些什么。因此,为了避免给他们留下终身的印象,我在这里只想

说,感谢上帝,我的家人都很好、很幸福,并(正如我们的芬兰朋友所说的)向他们表示问候。

对本书有特殊功劳的两位人士是:维尔·史密斯影音公司(Vere Smith Audio-Visuals)的理查德·巴尔(Richard Barr),他耐心地向我介绍了文字处理的各种好处;马丁建筑公司(Martin Builders)的罗伯特·马丁(Robert Martin)非常精心和有才能地建造了研究室,本书的大部分得以在那里完成,而非常重要的电脑现在也都存放于此。

我对这两位表示尊敬和感激的方式是专注于我的事业,他们长远、美满、成功的生活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我生活的城镇和我任教的大学,而他们的视野却远不止于此。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

1987年2月于俄亥俄阿森斯

注 释

1.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New York: 1982)。

2. 对最后这一点的迷人和富有思想性的阐述,可参见 Richard E. Neustadt and Ernest R. May, *Thinking in Time: The Uses of History for Decision-Makers* (New York: 1986)。

东方编译所译丛·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

长和平——冷战史考察	[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 著 潘亚玲 译	46.00 元
利益、制度与信息：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	[美]海伦·米尔纳 著 曲博 译	38.00 元
民主国家的承诺：立法部门与国际合作	[美]莉萨·L. 马丁 著 刘宏松 译	30.00 元
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	[美]肯尼思·J. 奥耶 编 田野 辛平 译	32.00 元
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思想史	[美]本杰明·J. 科恩 著 杨毅 钟飞腾 译	30.00 元
国际关系精要(第三版)	[美]卡伦·明斯特 著 潘忠岐 译	35.00 元
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	[英]巴里·布赞 等著 潘忠岐 等译	58.00 元
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	[美]约翰·J. 米尔斯海默 等著 王传兴 译	55.00 元
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第七版)	[美]小约瑟夫·奈 著 张小明 译	38.00 元
干涉的目的	[美]玛莎·芬尼莫尔 著 袁正清 等译	22.00 元
战争与国家形成	[美]许田波 著 徐进 译	35.00 元
驯服美国权力	[美]斯蒂芬·M. 沃尔特 著 郭盛 等译	28.00 元
国际政治理论	[美]肯尼思·华尔兹 著 信强 译	32.00 元
系统效应	[美]罗伯特·杰维斯 著 李少军 等译	40.00 元
大国政治的悲剧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 著 王义桅 等译	46.00 元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美]亚历山大·温特 著 秦亚青 译	45.00 元
变化中的对外政策政治	[英]克里斯托弗·希尔 著 唐小松 等译	36.00 元
世界事务中的治理	[美]奥兰·扬 著 陈玉刚 等译	25.00 元
大棋局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著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译	23.00 元

美国和诸大国	[英]巴里·布赞 著 刘永涛 译	25.00 元
战争的原因	[美]斯蒂芬·范·埃弗拉 著 何曜 译	30.00 元
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	[美]罗伯特·吉尔平 著 杨宇光 等译	38.00 元
国家与市场(第二版)	[美]苏珊·斯特兰奇 著 杨宇光 等译	27.00 元
国际制度	[美]莉萨·马丁 等编 黄仁伟 等译	50.00 元
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	[美]彼得·卡赞斯坦 等编 秦亚青 等译	48.00 元
霸权之后	[美]罗伯特·基欧汉 著 苏长和 等译	28.00 元
全球政治经济学	[美]罗伯特·吉尔平 著 杨宇光 等译	36.00 元
帝国的悲哀	[美]查默斯·约翰逊 著 任晓 等译	24.00 元
美国的致命弱点	[美]理查德·福肯瑞斯 等著 许嘉 等译	22.00 元
美国和美国的敌人	[美]伊多·奥伦 著 唐小松 等译	20.00 元
建构安全共同体	[加拿大]阿米塔·阿查亚 著 王正毅 等译	25.00 元
美国时代的终结	[美]查尔斯·库普乾 著 潘忠岐 译	28.00 元
欧洲的未来	[美]戴维·卡莱欧 著 冯绍雷 等译	28.00 元
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	[美]罗伯特·吉尔平 著 杨宇光 等译	22.00 元
国家的性格	[美]安吉洛·M.科迪维拉 著 张智仁 译	20.80 元
世纪之旅	[美]罗伯特·A.帕斯特 编 胡利平 等译	22.00 元
预防性防御	[美]艾什顿·卡特 著 胡利平 等译	14.00 元

以上图书均可在上海人民出版社读者服务部购买到。

邮购地址:上海市绍兴路 54 号上海人民出版社读者服务部

邮 编:200020

联系电话:021-64313303

邮购方法:在定价的基础上加收 15% 的挂号邮寄费,量大者(请先致电联系)可免邮寄费。

欲了解更多相关图书,请浏览上海人民出版社网页:www.spsh.com.cn。

目 录

序言 / I

第一章 历史遗产：冷战前的俄美关系 /1

第二章 获胜后的不安全感：美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苏联威胁观 /21

第三章 势力范围：美国与欧洲，1945—1949 /59

第四章 划分边界：东亚的“环形防线”战略，1947—1951 /93

第五章 自我慑止的源起：美国与不使用核武器，1945—1958 /140

第六章 分化对手：美国与国际共产主义，1945—1958 /197

第七章 学习忍受透明度：侦察卫星机制的出现 /262

第八章 长和平：战后国际体系的稳定因素 /288

参考文献 /332

第一章

历史遗产：冷战前的俄美关系

俄美关系¹史持久、复杂而不明晰，为各种明显不同的解释观点留下了合理的空间。1944年战时合作高峰时，福斯特·雷亚·杜勒斯(Foster Rhea Dulles)出版了美国首部全面阐释这一关系的著作，认为两国并不存在永久敌对的基础：“它们已没有让自己卷入针对彼此的战争的理由，它们应当能继续和睦相处。”²但到1950年，另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托马斯·A. 贝利(Thomas A. Bailey)却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认为“现在的斯大林主义，正如过去的俄国沙皇独裁政治一样，在意识形态上与民主政治格格不入”。对美国人而言，共存需要他们保持“头脑清醒、精神镇定、枕戈待旦”³。不光美国历史学家可能从相同的证据中得出不同结论，苏联的历史学家也坚持他们的观点，有时甚至与其美国同行大相径庭。⁴

这一切毫不令人惊奇。基于个人经验、历史理解及所生活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历史学家往往将一些学术见解融入对历史的书写中。就苏联和美国而言，背景差异非常之大，我们从如此不同的视角观察历史“决非偶然”，如同苏联历史学家喜欢说的那样。当然，这也发生在俄美关系的研究中，我的研究以及本书所集中讨论的冷战时期的苏美关系便属于这一领域。

但苏联和美国的关系不是从德黑兰会议或雅尔塔会议、甚或哈里·杜鲁门在富兰克林·罗斯福逝世后不到两周时与苏联外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 Molotov)的著名对峙开始的。自18世纪后半叶起，美国人和俄国人已在不同层次上相互接触，其友好和敌视程度

也因时而异。要理解过去 40 年里让我们如此关注的这一关系,我们就不应当将其与之前 180 年左右的俄美关系历史发展相割裂。

—

事实上,俄美“友好”有着悠久的传统,尽管不幸的是这更多是在早期而非后期。这一“友好”开始于 1780 年弗朗西斯·达达(Francis Dada)寻求圣彼得堡承认新生的美利坚共和国的失败之旅,结束于 1867 年的俄美交易或阿拉斯加交易之后不久。苏联历史学家博尔霍维季诺夫(N. N. Bolkhovitinov)有关前半期的俄美关系的著作至今尚无人超越,将来也不太可能有人能超越。他提醒我们,不应当“展示一幅理想化的图景,并虚构俄美之间不存在分歧或敌对的印象”。对他来说,早期俄美关系的教训是“并非没有分歧和冲突,而是历史证实了克服分歧和冲突的可能性”⁵。

愤世嫉俗者可能认为这过于陈腐。他们可能指出,考虑到 19 世纪俄美交往不那么频繁,两国间的“友好”可能如同今天瑞士与冰岛间的“友好”一样引人注目:首先就没有那么多导致敌对的机会。

但这一观念过于狭隘。苏美之间存在不少冲突的领域:试想,现代史上第一个成功的共和革命对专制主义带来的意识形态挑战;或在太平洋西北部有关领土和捕鱼权的竞争;或俄国对欧洲复辟在拉丁美洲的殖民统治的支持;甚或在克里米亚战争或美国内战的关键时刻,以“四两拨千斤”的“倾斜”改变势力均衡的可能性。此外,围绕如何对待对方公民和外交人员上多次爆发的摩擦,以及对对方媒体报道的相互抱怨等。值得探讨的是,这些 19 世纪的敌对是如何得以管理的,使其未对俄美间多年的相对友好关系带来大的负面影响。

主要的解释是,借用新近的术语,双方都有容忍不同社会体系的国家共存的意愿。如同尼古拉·西瓦切夫(Nikolai Sivachev)教授后来所观察到的,美俄在政治组织、阶级结构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没有比安德鲁·杰克逊时期的美国与沙皇尼古拉斯一世时期的俄国间更大的了。⁶在

1832年抵达圣彼得堡后，美国的詹姆斯·布坎南公使发现“沙皇对地球上最自由的人民不吝善意……对美国人致力于培育友谊更是心存感激”。布坎南报告说，原因之一在于美国人的这一传统，即在“关注我们自身事务的同时，也允许其他国家关注他们的自身事务”；这是一种“对我们的对外关系有着最理想的影响”的办事方式。⁷的确，那一时期的美国人并没有多少强制性冲动去改变或官方评论其他国家的国内政治或社会局势。对那一代的外交官而言，外交政策是一种促进自身国家利益的手段，而非寻求改变他人的工具。

但布坎南的报告也暗示了早期俄美关系中冲突相对较少的另一个原因：这便是俄国认识到“此期的欧洲是个大火药桶，任何一点火星都可能导致一场爆炸，极大地动摇所有君主”，“在这样的背景下，她（俄国）充分意识到，英国和法国肯定会反对俄国”。⁸那一时期的美国人、至少是美国领导人在涉足世界政治时很少是天真的。他们充分注意到国际均势的运转，并没有错误地假设地理位置可使美国免遭影响；他们决定在其能力限度内利用均势促进美国的利益。就与圣彼得堡的关系而言，这意味着与俄国人的合作，因为俄国人可能对来自英国和法国的威胁加以制衡。

这样，正是这两个迥然不同的国家在19世纪中叶各自面临重大危机时相互提供了适度的帮助。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美国人对俄国人保持了善意中立，这导致了伦敦的相当不满。⁹更为重大的是，在美国内战期间，俄国人拒绝与大英帝国和法国在强加有利于邦联军的调解安排上进行合作。¹⁰这一实质性合作的一个成果可能是1867年俄美的和平交接阿拉斯加；几乎没有人会怀疑其实现的可能性，但如果华盛顿和圣彼得堡的关系比较冷淡的话，它就不会来得如此快速和轻松。可以肯定，这一时期还反映了可说是促进友好关系发展的第三种趋势：俄国政府的现实主义，它承认自身无力与美国在西半球的任何一地竞争影响力。¹¹

博尔霍维季诺夫(Bolkhovitinov)教授是正确的：我们不对19世纪早期的俄美“友好”持罗曼蒂克的想法，因为它根本不是那样的；它是一种基于互不干涉内政、认识到共同外部危险的互惠关系。当你回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丧失这些原则后俄美关系的全面且迅速恶化时，你就会意识到这些原则有多重要。

二

1917年前俄美关系恶化的责任在相当大程度上应由美国政府及其人民承担。从购买阿拉斯加到沙皇被推翻的50年间,俄国政府对华盛顿的态度几乎没有变化。也无证据显示,俄国观察家一贯对美国的传统友善在世纪之交时演变成了更大的观念上的敌视。¹²

但美国的政策和态度在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发生了变化。第一,到1900年,技术与东亚地区权力真空一道,诱使美国在远超出其领土的地方宣称其权威,导致了与俄罗斯帝国所认识到的地缘政治利益冲突。第二,此期的美国政府逐渐放弃了传统的观念,即其他国家的内部特征不会对其外部关系产生影响。一种新的外交方法得以确立,其基础是国内制度与外交政策间的假想联系,特别是国内专制与在世界上奉行宽容、自制、相互合作的实践无法达成一致的观念。

因为第一个发展已经得到充分的、尽管不是最新的讨论,¹³因此没有必要详述。只需指出一个离奇的重合,即新技术同时导致俄国与美国20世纪初在东北亚陷于冲突:首先是通过跨西伯利亚铁路为俄国提供了向东北亚投放重大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手段;然后通过鼓励美国使用其新的海军力量,与其他欧洲大国和日本一道,和俄国竞争因中国政治权威衰落而留下的权力真空地带。技术革新将不断让两国发现先前未知的重要利益,或让两国假设如果不迅速采取行动保卫它们,便可能导致不明确的伤害。

当然,华盛顿的反应是“门户开放”政策,显然这是历史一贯手法的一个例子,即通过宣布公正不阿来追求自身利益。那一战略反映的到底是天真的理想主义还是狡猾的算计,人们可能如同美国历史学家一样充满分歧;也可能是二者兼有。¹⁴毫无疑问,对从经济上进入中国、并保持中国领土完整的美国利益的肯定,与俄国在1896年后与中国人达成的安排所建构的势力范围——四年后在义和团起义中俄国加以单方面扩展——是

相抵触的。

“门户开放”的另一重要后果是美国利益与英国利益的自觉联盟。在这里,历史趋势也发生了逆转。早期俄美关系的一个要素是对英国的共同反感: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这一共同敌人以一种松散但却明显的利益重合将两国联系起来。但“门户开放演说”反映了自1895年以来英美之间的和解;1902年英国与日本的结盟得到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默认,两年后日俄战争的爆发导致圣彼得堡陷入外交孤立,都表明这一趋势日益朝向不利于俄国的方向演变。罗斯福为了圣彼得堡的利益而介入朴次茅斯和会,源于其维持均势的决心,并未反映出任何对俄罗斯帝国的特殊同情或亲密关系;当时,这一均势可能因日本在东北亚不受挑战的主导地位或俄国内部的社会瓦解而受威胁。¹⁵对罗斯福的继任者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来说,仍是通过有欠考虑的促进美国在中国东北经济影响的计划,疏远俄国和日本,¹⁶结果是,俄美利益的地缘政治联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已经丧失殆尽。

关于美国对俄罗斯帝国内部结构态度的变化的研究远不充分。这一问题所涉及的是观念的完全逆转,是从美国可与不同社会体系的国家共存的观念,转变为确信这种共存不再可能。美国人一直敏锐地认识到其国内体系与大多数国家有多大的不同。他们对这一国内体系相当自豪,并认为其他国家终归会效仿它。美国人认为它有义务尝试改变其他国家的国内体系,但在19世纪末以前,美国从未将它当作其根本国家利益:的确,据认为,这样的强制性做法可能侵蚀美国人试图保留的基于自由选择原则建立起来的体系。¹⁷因而在19世纪20年代拉丁美洲和希腊的民族独立运动,或被1848年革命破坏的欧洲自由运动中,美国人尽管内心同情,但并没有做出正式的干涉努力这一点很重要。¹⁸直到1863年,华盛顿方面为了维持俄国人善意这一地缘政治利益,国务卿威廉·西华德仍未就是否支持波兰起义作官方表态。¹⁹

但一切都在19世纪最后十年里改变了。到19世纪80年代,美国开始对俄国提出抗议:不只对持有美国护照、到俄罗斯旅游的犹太人遭受的迫害,而且也对俄罗斯国内的犹太人遭受到的迫害提出抗议。²⁰到19世纪90年代,多方面的压力要求华盛顿方面就俄国的政治犯问题表态;这

些压力中不少是由老乔治·凯南的书和演说所煽动的。²¹1903年,罗斯福政府公开谴责沙皇政府在基希讷乌(Keshinev)的大屠杀;1911年,面临着公众和国会的巨大压力,塔夫脱政府废除了1832年詹姆斯·布坎南出访时与俄国达成的贸易条约。1915年,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与其心腹爱德华·豪斯(Edward M. House)上校达成了一致认识,即击败德国可能导致一个至少同样有违美国利益的独裁者统治欧洲,那就是俄国沙皇。²²

这便是美国政府立场的重大变化,我们的确不了解其变化的原因。有好几种可能的解释:公共教育与文化能力的提高;发行量空前的出版业的兴起;旅游及旅游兴趣的增加;以及如历史学家诺曼·绍尔(Norman Saul)所称的“个人作为核心关切”的出现,“其使命是改善公共知识……有人简单地将其当作职业,其他人则还有着社会关切批判的热情”²³。就在亚历山大二世因镇压起义而导致1881年被暗杀后,这些有关俄国的新信息来源也开始在美国繁荣起来:人们对当时的便宜新闻报纸、流行杂志、拥挤的演说等印象深刻,它们与多年后越南战争时期电视将战争的野蛮呈现在国内有着相同的效果,使美国人感受到了专制的本质。

但我们必须超越信息扩散在转变对俄国的态度方面的解释力问题:你必须同时考虑到美国政治结构的变化。可以肯定的是,在19世纪末,还没有出于国内政治目的而开发外交政策的新习惯。这是个旧的重大传统,至少可追溯至18世纪90年代联邦党人与对手杰斐逊主义者之间的辩论。出于反抗前人的心理满足,以及由于美国国内爱尔兰移民数量的大幅增加两方面原因,在整个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将政治与外交混为一谈的倾向主要针对英国。但到此后的几十年里,好几百万来自俄罗斯和东欧的移民使得这些国家也可能成为众矢之的;而强化这一趋势的是这一事实,即在俄国遭受种族歧视最为严重的一个团体——犹太人,在美国政治和经济权势集团内部的显赫位置上有了信奉相同宗教的盟友。罗斯福正是出于讨好这些团体而对基希讷乌的大屠杀提出正式抗议;²⁴类似的考虑也导致塔夫脱政府于1911年屈服于压力而废弃了1832年达成的美俄贸易条约,参议员亨利·杰克逊(Henry Jackson)完全赞同这一说法。²⁵

有理论认为,对俄国的新的、不怎么友好的态度与美国进步主义改革运动的兴起也有某种关系。改革运动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尽管存在诸多争论,但仍未被很好地理解。但似乎很明确的是,进步主义高度重视某些特定要素,如效率、诚实、秩序、社会公正,而这些都不是沙皇俄国生活中的重要特征。在朴次茅斯和会期间,罗斯福私下里指责俄国人,认为其不仅“背信弃义”、“诡计多端”、“反复无常”,而且“腐败”、“无能”、“低效”。²⁶对罗斯福而言,这是最严厉的指控。

西瓦切夫(Sivachev)教授在其新近的有关分析中认为,美国的“垄断主义者”是否对俄国监狱的条件感到不满,或是否沙皇为美国以私刑处死黑人而感到不安,确实都不太重要。他认为,真正的竞争是经济性的,美俄都首先聚焦于远东。²⁷在这里我必须恭敬地提出异议。毋庸置疑,竞争该地区的影响力很重要,但我认为同样重要的是,必须把握美国在这些年里对其他国家内部局势的态度变化的本质。我们放弃了不同社会体系的国家可以共存的传统,而习惯于将他国社会体系转变为与我们相同的体系。我们为此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但却鲜有成功。塔夫脱在俄国的经历,威尔逊在中国、墨西哥、中美洲以及加勒比海的经历,全都证明了这一点。在每一个案例中,出于改造目的而进行的干涉往往与现有和潜在的经济利益相背,这正是为什么 20 世纪 20 年代共和党政府会放弃这些政策的原因。

除非我们同意这一观点,即美国外交政策和美国人民有时为纯粹利益之外的考虑所驱动,否则在理解美国外交政策及美国人民的本质的道路上,我们不会取得多大进展。美国人处理与世界其余地区关系时的“人道主义”本能是真实的,不管它多么具有误导性、多么不切实际,甚至有时看起来多么自私。如果我们要解释美国对世界其余地区经常展现出的令人困惑的行为,就必须考虑包括经济利益在内的大量其他因素。

三

如果坦率地承认美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美关系恶化所负的责